

HONG HUANG LU



红·黄·绿

——朱向前新军旅
文学批评

朱向前 / 著

RED YELLOW
GREEN
HONG · HUANG · LU

● 在高明画家的
手中,只要有了红、
黄、蓝三原色,便
会有七彩缤纷的世
界。而军旅文学世
界五彩斑斓的“调
子”,亦需出自于
这三种基本颜色。红
· 黄 · 绿。

解放军出版社

红·黄·绿

——朱向前新军旅文学批评

朱 向 前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7.875 印张140千字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065-0769-2/I·105

定 价: 2.30元

序

理性激情的开发

徐怀中

要是说，近年来军事文学创作的发展，显得有些沉闷、徘徊多于跃动的话，关于军事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建设，就更不能令人感到振奋了。从事军事文学批评工作的，至今也还只是屈指可数的十余人。而绝对数量的微小，又必然影响相对的质量，散兵游勇，布不成阵，打几声冷枪，换一个地方；大家谈论起来，总有些人意难违命天之感慨。因此，当我看到向前这本评论集子的时候，感到格外亲切，在这被冷落的土地上，甘于寂寞而又劳作不辍的，仍然有人在。

我曾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三十五位同学一起学习过一段时间，我所能给予他们的，太少太少了，倒是他们，常常在许多方面启发了我，帮助了我。就说向前吧，他最初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在第一次全系学员的讨论会上，——不知是由于

新来乍到的生疏，还是作家的矜持，讨论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我作为主持人，心中不免暗暗发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几个事先打过招呼的班长们身上。果然，朱向前跳出来了，侃侃而谈，云山雾罩，居然一口气就讲了四五十分钟，且大有欲罢不能之势。使我惊喜的是，他不仅为讨论会解了燃眉之急，还表现出了较好的理论素质。那番发言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等刊的《小说“写意”初探》。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从那以后，向前的理论热情被点燃了，不断地喷射出闪闪烁烁的火花。

军艺文学系的同学们相处一段时间后，便相互发现了别人具有某种优势，这是决不可不给予充分估计的。就向前而言，他的优势似乎是在于，除了与许多人一样，年岁不算大，却也经受过生活的风霜，有这一代人多思而早熟的共同气质，此外他还接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军艺前，他已在福建电大学习四年，八个学期中有六个学期被评为优秀学员。至于军艺文学系的教学，则是天才教育式的，荟萃北京的名流学者、专家教授、作家批评家，拿出各自呕心沥血的见解来，叫它是密集式的知识轰炸也好，叫它是高信息强输入也好，总之它要求学员有相当的基础准备，方能够获益匪浅，得到理性的升华。水之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向前恰恰是在这坚实的根基和天马行空式

的教学中，寻得了自己的优势。

我这样说，并不是扬批评而抑创作，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要求，也许最理想的是二者融汇贯通。向前确实是创作与批评二者得兼的，创作中有一些感悟，就形成了他的理论文字，理论上的思索，又反过来作用于他的创作。他写过诗，写过散文，后来又致力于小说，虽然所作不多，却每篇都能多少见出一点独特的思想来。正因为创作与理论并重，又总是生活在一个作家群的环境中，他的批评就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与创作“不隔”，他的评论文字，总是贴紧创作现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他曾经称道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是“形而下”的理论（“下”到创作之中），是具有启发创作的实用性的（这里的“实用性”并非贬意），向前自己的批评也可以作如是观。他的又一特点，是常常从思考创作的缺憾入手，这既见出他头脑的清醒冷静，又与他从事创作实践时不得不反复掂量是分不开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每一次都是新的突破，而突破，又往往是从最薄弱最不足的地方着手的，于是，他谈“疲劳感”，谈停滞，谈困境，借以知人和自省。当然，这种挑毛病，反弹琵琶的思路，若是形成一种定势，怕也会束缚思想，妨碍他的理论激情的开发和拓展。不知向前以为如何。

1988年9月9日 北京

目 录

■ 序

徐怀中〔1〕

■ 红·黄·绿：军旅文学世界三原色

□ ——对军旅文学创造的一种模糊认识

.....〔1〕

■ 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

.....〔6〕

■ 在文学世界的背后

□ ——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的一种研究

.....〔29〕

■ 我看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

□ ——兼论近年来的军旅文学嬗变

.....〔36〕

■ 军旅小说创作的“疲劳感”

□ ——军旅文学现状检讨之一

.....〔44〕

■ 电影模式与思维结构

☐ ——军旅文学现状检讨之二	[50]
☒ 急需有一张理论的翅膀	
☐ ——军旅文学现状检讨之三	[57]
☒ 军旅文学：面临艺术变革的挑战	
☐ ——军旅文学现状检讨之四	[61]
☒ 本世纪无大战：军旅文学的困境	
☐ ——军旅文学现状检讨之五	[67]
☒ 军旅文学：瞭望在两个十年之间	
☐ ——新时期军旅作家个体印象批评之一	[74]
☒ “莫言”莫可言	[93]
☒ 天马行空	
☐ ——莫言小说艺术评点	[99]
☒ 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	
☐ ——莫言小说漫评	[122]
☒ 《红高粱》：穿透历史的悠长召唤	
☐ ——兼谈历史战争题材创作中的“当代意识”	

.....	[129]
■ 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	
□ ——莫言小说“写意”散论	
.....	[134]
■ 马·猫头鹰·牛犊	
□ ——为“莫言游戏”作注	
.....	[153]
■ 宋学武短篇结构艺术演进	
□ “线型”——“线面组合型”——“立体空间型”	
.....	[159]
■ 宋学武和他的“战争心态小说”	
□ ——对宋学武创作发展的“倒金字塔式”模态描述	
.....	[166]
■ “军歌”的变调和张波的变化	
□ ——谈《军歌变调又名蒙昧年代》随想	
.....	[180]
■ 风情如画 波涛如歌	
□ ——评陈道阔两部中篇新作	
.....	[187]
■ 象征叠加:《野性的冰山》	
.....	[191]

附录

■ “灰”与“绿”	
□ ——关于《文学创作论》的自我对话	

.....〔195〕

■ 小说“写意”初探

.....〔212〕

后记

.....〔237〕

□红·黄·绿：军旅文学世界三原色

——对军旅文学创造的一种“模糊认识”

● 载《光明日报》（1988年7月29日）

在高明画家的调色板上，只要有了红、黄、蓝三原色，便会有七彩缤纷的调子，便会有五光十色的世界。——我想借此作为比喻，来表达我对军旅文学创造的一种认识。

若论军旅文学世界的“调子”，或清雅、或辉煌，或明快、或凝重，灿烂斑驳，无所不有。但究其实亦盖出于三种基本颜色：红、黄、绿，盖出于这三原色的相互调配、融渗与变化。——当然，颜色在这里仅仅是一种象征。所谓“绿”，亦即“国防绿”，指的是军队特色，它包括军队的生活样态、军人的外部行为、军营建筑、军事设施、战争景观和战场风貌等，以及在这绿荫中萌生的军人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文化心理等。所谓“黄”，或喻黄河、黄皮肤、黄土地，顾名思义，是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和文化的代称。它的涵盖面当然比“绿”更为广泛，绿色是从黄土地上长出来的，中国军人是从黄土地

上走出来的，所以，它包蕴了中国军人深远的心理积淀，和军旅文学宏阔的文化背景。至于“红”，含义更多元一些，它既是炮火之色，又是鲜血之色，还是我军的军旗、五星和领章之色；它既可以象征战争，也可以象征我军性质，还可以象征人的生命。总之，“三原色”只不过是一个比喻——而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对它的内涵所指，也只能是一种模糊把握。但仅仅凭着这样一种“模糊认识”，我想也大致可以说，一个军旅作家能否有出色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对“三原色”理解的深度以及调配它们时所把握的比例关系和分寸感是否恰如其分。用这种标准来检索目下军旅文学的“画面”，即可发见其“色调”都略有偏差。

一种是偏“绿”。这主要表现在军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军旅作家的作品中。由于他们降生并成长于军营摇篮之中，从小便承受着绿色乳汁的哺育，往往尚未成年又少小从军，使他们熟知军队，热爱军人，毫不犹豫地献身军职选择的艰难与荣耀。因而，他们的笔就容易抓住和突出乃至强化军队特色，甚或为了塑写理想军人而不惜以牺牲真实性作代价。试加比较一下同是揭示非常岁月中人生悲剧后面的政治文化背景的《第三只眼》与《新兵连》，就不难觉到其“色调”的差异。——《第三只眼》的犀利是得益于对军队特殊政治机制的洞见，作者对农民文化心理的审视与曝光更多地是站在局外人亦即非农人的角度来进行，是一种大夫式的诊断；参照物是

理想军人的行为准则。这样，当他凝眸农村战士的缺陷之时，一方面可以脱出“此山中人”的遮障，认得更准，看得更深；另一方面却也少了“此山中人”的切身感受，显得激切而不够圆融，苛厉而缺少温情。作品于遒健雄强之中，透射出几许理性的冷峻之光，也泄漏出几分情感的冷酷之色。《新兵连》悲剧力量的激扬则是建立在对于农民文化心理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的，作者对农民的种种劣根性如自私、狭隘、猥琐与虚荣等等都是一种“自我诊断”式的揭示（作者刘震云就是一个退伍农村战士），他“身在其中”而超越其外，通过塑写半是农人半是军人的“农村新兵”的悲剧，表现了中国农民转入中国政治文化机制运行中的自戕与自救的痛苦过程。它也许不及《第三只眼》尖深有力，但却显得更素朴、更本色（黄），也更具生活的魅力。其残苦悲烈之处，既刺人激忿，又引人伤情，油然升发一种怜恨交加、歌哭混杂的复合情感。——也许，最好的办法是把两部作品结合起来读，那么，就有了两个角度的互为参照，互为补充，所得一定更多。

我始终认为，中国军人的基本成分是农民，中国军人的心理不可能不笼罩上农民文化的折光。质言之，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就是农民心理。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就是农民文化。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觉得朱苏进、乔良、海波等人的作品“调子”偏“绿”。

还有一种是偏“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家庭出

身的青年军旅作家的作品中。当然，他们来自农村，了解农民，这原本是写好中国军人的先天优势，但在我看来，他们这种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写得更多又更好的往往并非军人而是农民（如莫言、宋学武、周大新等）；二也是更主要的方面，即他们普遍缺乏一种对农民清醒的批判意识。不论是李存葆执著于提扬升华农民军人身上的优点与美德，还是莫言偏执于对农民军人进行恶作剧式的嘲讽讥刺（想想《金发婴儿》中的孙天球指导员吧），抑或是宋学武力图不偏不倚地摹写本真式的农民军人，不是洋溢着一派农民的自豪感，就是掩藏着一种农民的自卑心，都还没有真正自觉的深刻冷峻的自我反省和批伐精神，反而常常流露出某些与旧传统藕断丝连的深层意识。而依我看来，中国军队不仅集中了中国农民的“优根性”，也直接承传了其“劣根性”。因此，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如果一味满足继承发扬革命传统，而不注意强化当代意识和渗透军人意识，并对农民文化心理进行剔抉与扬弃，也就很难完成建设现代军人品格的历史任务。

最后，我还想强调的是，无论“绿”抑或“黄”，都应该以“红”为其底色——我这里说的红色主要还不是炮火之色或军旗之色，而是鲜血之色——人之象征。换言之，就是强调把写人当作军旅文学的最终目的。目前的军旅文学作品中，恰恰是红色都比较稀淡，相当多的军旅作家为短视的功利主义驱

使,还没有注重通过军旅文学这个特殊的表现途径,去揭示人的人性深度和文化心理、生存状况等等,反而常常把人当作了传达和宣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之类的载体或工具。应该看到,军队毕竟是一种暴力工具,战争更是与人类寻求和平的愿望相悖。作为军队这个武装集团的成员,作为某场战争的参与者,每个置身其中的军人,他的理智与情感会遇到怎样的矛盾,他的人性将受到怎样的压抑和扭曲、裂变与重构、沉落与升华呢?我认为,比较非功利的、超越的、属于人类的军旅文学应该思考到这种深度。而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军旅文学作出表相的英雄主义和肤浅的乐观主义的理解与处理。

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了红、黄、绿三原色的交溶——有了军旅特点、民族精神和人性内容的交织,军旅文学的画卷方可能比现今更加雄浑,更加深邃,更加辉煌,和更加绚丽多彩。

□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 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

● 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一个醒目的军旅文学现象长期为人们习焉不察——在新时期军旅文坛上特别活跃着两类青年作家：一类出生于军人家庭，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钱钢、简嘉等（实际上还包括绝大部分女青年军旅作家，如何晓鲁、刘宏伟、王海鸽、丁小琦、庞天舒等）；一类出生于农民家庭，如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唐栋、雷铎、周大新、陈道阔等。这种现象究竟包蕴了什么样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呢？本文即试图从他们不同的身世经历入手，主要取社会心理（上篇）和文化心理（下篇）两个角度切进，力求客观公允地通过两类作家的比较研究，来寻找他们各自的特点，进而涉及到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重要课题——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的初步探讨。

上 篇

广义而言，历史而言，我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数千年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农民战争。本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也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农民。所谓出身农民家庭的青年军旅作家，一般都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参军前就是地道的农民（李存葆初中毕业、莫言高小辍学、宋学武高中毕业后务农）。而所谓出身军人家庭的青年军旅作家，虽然都是生于军营，长于军营，尔后穿上父辈的军装，但实质上也大多是农民后裔，上溯到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也差不多都是农民了。——和农民或亲或疏的血缘联系，是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共同之处，这也是由中国革命和中国军队的特点与性质所命定的。然而，一个是出生于直接的农民家庭，一个是间接的农民家庭，这就有了差异，这就使得他们象军旅文学大树上长出来的相距很远的两根枝桠。

我认为，基本的差异就在于军人家庭和农民家庭其政治地位、经济条件、文化教养、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并由此决定着他们相异的个人际遇和个别的情感世界等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观点，这种种不同势必深刻而久远地作用于他

们的创作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我想在这儿简要提示的是，从作家生成学和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应该特别重视童年生活对一个作家心理的深刻影响。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作家的创作实际上从童年就开始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严肃而悠长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①。事实上，直接以自己童少年生活为蓝本创作而成的世界名著就颇为不少，如俄苏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英国劳伦斯的《儿子和情人》，以及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

那么就让我们对这两类作家作一个粗略考察吧。——他们一般都在建国前后出生（上限到李存葆，1946年；下限到莫言，1956年），在童年、少年或青年前期，都或深或浅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里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两类作家虽然都经过了这场浩劫，却未能从中获取更引人注目的文学建树。这主要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新时期十年迄今，他们还少有直接而深刻反映文革动乱的扛鼎之作；二是军队既没有出现“知青作家群落”，甚至也没有一个象张承志、阿城、韩少功、王安忆、史铁生这样以反映知青生活见长的作家。原因何在？这不能不归结到家庭所造成他们个人在文革中颇为特别的遭际。